

李健:仍是少年

文/本报记者 韩雪 图/本报记者 姜贵东

李健:

第十二、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。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, 博士生导师。教育部经济与贸易类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, “首都十大教育新闻人物”, 国家一级专业社会团体《中国诗酒文化协会》副会长。

记者手记

李健和李健们

本报记者 韩雪

提到李健这个名字, 大多数人第一反应, 是那个歌手李健吗?

不是, 这个李健, 没有那么帅, 也没有那么潮。

他长相普通, 穿着朴素, 常年黑白灰蓝傍身, 一看就是搞研究的。

接触几次, 又会发现, 他的脾气很平和, 走路慢悠悠的, 语速轻缓, 见人也总是乐呵呵的, 还能叫准许久不见的人的名字。

怎么看他, 都好像一块被时光冲刷许久的圆石, 毫无锋芒和棱角。有时候甚至怀疑: 这不是个老好人?

但有一次长聊, 我被他的犀利和深刻镇住了: 从头到尾, 他不会热烈地赞扬谁, 也不会激烈地批评哪一个。但总会在讲述到大家常见的现象时, 冷静地揭开问题背后的一些问题。也会在那些大众抱持的观点之外, 告诉你, 他与众不同的观点和所支持的论据。

他不是活跃在舞台上的明星, 他是奔走参政议政平台的委员。他倚靠的是清醒的头脑、独立的思考和冷静的表达, 以及为国履职、为民尽责的爱国心、政协情。

在210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当中, 有这样一个李健。

在全国60多万政协委员当中, 有许多个这样的李健。

认识李健委员好几年了, 记得第一次见面, 是4年前跟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的一次调研活动中。

那是在北京飞赴湖南的航班上。我拿着登机牌找到了自己的座位, 就看到我的座位旁边, 早已坐定了一位难测出具体年龄的男性。平静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, 身着浅色衬衫、深色夹克的身形仍很瘦削。由于正低着头看手机, 能看到他一头的黑发不算浓密却也均匀。能大致判断, 这人在40岁到50岁之间。

坐下后攀谈了几句, 知道了他的姓名, 李健。说话间抓紧用手机百度了一下, 52岁,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、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。结合身份, 才豁然他的年轻感从何而来。

学者尤其是高校学者, 由于经常和学生在一起, 普遍看起来都比较年轻。

后来, 局限于他身上所附着的“理工院校”“人文社科教授”的标签, 对他的采访定位始终不是很清晰。虽然一直断断续续地保持着工作联系, 也直接采访过他, 又时不时看到本报同事、别家同行对他的报道, 还几次在全国政协协商议政活动中看到他现场发言的身影。但一直, 这位学者型委员自带的课题不多, 受到媒体的关注也并不算太热烈。

今年两会期间, 恰好跟李健委员在同一个驻地。接触深了, 发现像他这样的学者型委员身上, 对各类现象看得透、对存在问题思考得深, 敢说“人人心中有、口中无”的建议, 自带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率真风格。

但同时, 又由于表达严谨的牵制, 他的建议, 虽然也上过两会热搜的榜首, 却很少成为大众追捧的“爆款”。而在委员圈和学术层, 他则广受欢迎。总有人能读懂他规整措辞背后的未尽之言, 时常有观点相同者, 主动找他交流看法。而在专委会的媒体见面会上, 他是两个委员代表中的一个, 实实在在地向媒体回答委员该如何写好提案……

在驻地散步时, 李健就遇到过其他界别的委员迎面走来, 老远就冲他竖着大拇指, 夸他的建议提得准。他们站在路边交流时, 正好有日光拂过, 李健的黑发中, 也开始夹杂了灰白。

■数十年磨一剑: 这么远, 那么近

李健被其他委员夸赞的那条建议, 被质疑跟他的本职身份有点远。“不算远。”他自己说, “不都是学术界的事嘛。”

3月4日, 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开幕当天的上午, 李健在百度账号上, 发布了《让院士称号回归荣誉性、学术性本质的提案》。这个账号简介里, 李健进行了实名认证: 全国政协委员,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。

不到40分钟, 阅读量突破了百万。两会结束时, 已经有633.2万的阅读量。其中, 5.3万点赞的背后, 代表了人们的认可。

“院士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称号、荣誉称号, 不是职称也不是一种职位。”提这个建议, 李健经过了一番求证和论证。

不少正式或非正式的工作文件中, 直接标明“院士(副部级)”的并不鲜见。比照副部级待遇给院士分房子、配车、配秘书等现象也有存在。

语速慢的李健, 条分缕析地对比着两者的区别, “副部级是公务员级别中的一个简称, 院士称号是一个荣誉性称号, 与公务员的级别是不能画等号的。”

根据国家现行规定, 院士享受的工作待遇, 包括医疗保健、乘车等虽然相当于副部级, 但并不是副部级, 而且待遇本身, 是为了促进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, 以保障院士的科研条件。

一次会议上, 主持人介绍与会者的身份。当念到某个教授时, 李健听到主持人犹豫了一下, 还是念出了身份介绍括号中副部级这三个字。其实会前不久, 李健和主持人刚刚讨论过这个话题, 有着一致的观点。

再后来, 李健也忍不住在心底追问: “为什么会有这种挂钩?”

院士称号与行政等级直接挂钩, 容易



滋生学术的浮躁和对头衔的追逐。而提这样的建议, 是会得罪人的。

但现实环境使李健没办法不出声: “这时, 正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严谨治学、潜心研究, 攀登科技高峰, 突破‘卡脖子’技术, 建设科技强国。让院士称号真正回归荣誉性、学术性本质, 是正本清源啊。”
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, 李健也从中读出了明确的讯息: 国家是打算在稳基本盘的基础上布设新的重点, 重点主要是在科技投入上。

“十四五”期间,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%以上、力争投入强度高于“十三五”时期实际。”“2021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.6%。”这些内容, 就显示了国家对科技创新的重视, 也是面对一些国家科技掣肘采取的针对性措施。

毛泽东曾说过,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, 干部就是决定因素。同样的道理, 科研规划确定了, 科研人员就将起到决定因素。

科学探索是清苦且漫长的, 需要科技人员在安静的环境里潜心研究, 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, 实现关键核心领域的不断突破。院士, 正是科技金字塔尖的人, 他们的举动, 对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有着强烈的示范作用。

这是李健从院士称号这个角度提出建议的本心, 他特别希望能采取更有效的改革, 让院士称号真正回归, 引导科技工作者朝正确的方向努力。

“小时候, 我常去芷江机场游玩、劳动, 后来才渐渐懂得这座机场在抗战史上的重大意义。”李健的出生地湖南芷江因受降地而闻名, 爱国主义氛围浓厚。

对于李健来说, 大国远景, 也从来没有这么近地出现在眼前。但要真正实现, 又需要所有人承担各自的责任。

■“经济”根据地: 有点呆, 特别灵

犹记得那年在去调研的航班上, 李健委员竟然开心地主动聊到买衣服的话题。眼看着这位穿着中规中矩、风格偏于内敛的男委员, 还有一套自己的买衣心得, 这

让当时的我既忍俊不禁, 又心生好奇。

这种好奇, 并不是我一个人有。后来, 另外一个记者在对李健的报道中这样写道——

“采访时, 李健不经意间整了自己西装里面的衬衣, 想起了某品牌。因为工作关系要经常穿衬衣, 李健买过各种各样的衬衣, 最后留意到了该品牌, ‘这个品牌的男士衬衣, 之前穿着我就纳闷, 人家的衬衣耐穿, 袖口为什么怎么穿都是笔挺的, 还耐穿耐洗?’”

“后来有一次看新闻, 李健才知道, 这个品牌为做好了衬衣, 请到了钻研衬衣30年的吉国武。这位日本的‘衬衫大师’知道衬衫的许多秘密: 比如, 在衬衫领子下加个半衬, 能让领口挺括; 在袖口掏出6个褶皱, 可以贴合手臂; 衬衫的版型不同, 嵌条也不相同; 针脚越密, 衬衫的质感越高级等等。”

生活中处处可琢磨。学者的探究意识投射到实用的生活经验。

后来听到别的委员说起, 李健很有理财头脑, 话间后悔没有听他的意见, 错失了一次“发财”良机。我更加按捺不住好奇心, 直接问李健: “为什么这么会理财?”

“呵呵!”朴实的笑声之后, 李健说起了自己的专业。

原来,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 侗族青年李健从湖南边城芷江, 一路考到首都北京, 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经济学博士。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, 他师从著名经济学家李悦教授。“我们李老师还有个很出名的学生, 叫刘鹤。”李健的治学态度和敬业精神以及学术立场、思维方式的形成, 深受导师的影响。

身处工科院校, 李健所在的经济学科被统收入“人文与社会科学”这个“大口袋”里。而在工科院校里, 相应的文科归在一起, 统称为人文与社会科学, 它既包含人文学科, 也包含社会学。国际上, 这样的学科设置也很常见。

李健举例讲解着, “你看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工科院校, 它也有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, 当中的经济学科, 在全美排名前三。”

李健在课堂上, 从经济这个“根据地”出发, 通过学者研究的方式, 教育学生不仅

观察当下, 更眺望更长远的前景: “要关心国家大事, 需要认真地看文件, 在文件中找到发展的方向。”

在上世纪50年代,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是全球市值排名第一的大企业。当时, 沃尔玛还只是一个小的连锁商店。“现在呢?”李健告诉记者, 今日的通用汽车公司早已风光不再, 而沃尔玛后来居上, 跃身为全球最大的公司之一。

今天, 机遇仍在不断轮换。“那些年, 大家都往百货公司跑。现在, 电子商务崛起了, 传统商业无可奈何地走向没落。”从经济学的案例当中, 李健看到: “产业的机会是不断轮换的。”

■知识分子品性: 很平淡, 却浓烈

跟李健约过几次稿, 屡屡被他婉拒, 理由很简单, “我们学者看东西, 第一眼看见的是不足。”

这样的人往往是扫兴的, 尤其当大多数人群情激昂时, 李健往往不合时宜地“浇”上一“盆”批判的冷静。

而知识分子都有着相似的思维和品性。大多数人都在为中国抗疫成功兴奋骄傲时, 作为知识分子的王辰作出了冷静的判断: “我国的抗疫战, 赢的是社会组织的仗, 而非科技仗。”

对这位曾在疫情一线战斗过的王辰常委, 李健表达着他的认同: “科技方面, 我们还是有突破性的创新。解决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, 必须得开拓新的方法。”

冷静跟悲观是方向不同的两个词。面对当前疫情带来的危机, 李健又有着充沛的信心: “大的危机常常是大的机遇!”以企业的浮沉为例, 2003年的非典之后, 就涌现了京东、淘宝和腾讯等一批新型企业。

那么未来呢? 李健预言: “这次疫情一定会催生一批伟大的企业。”

往往越严谨冷静的表达, 越不容易被人关注到。这也让李健屡屡怀疑自己的表达方式。“可说话不能不严谨吧? 不严谨是有漏洞的。”

好在严谨深刻的品质, 在政协这个政治组织当中, 有着广泛的认可度。

2020年, 全国政协评选2019年度55件好提案, 就有李健的《关于设置“四级三类”学位体系, 推动多样化人才培养的提案》。

这条呼吁给大专生要“名分”的新闻, 迅速登顶网络热搜榜首, 引发热议。

有网友认为, 增设“副学士”学位有利于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; 也有质疑者表示, 只给一个“名分”并不能改变现状。

接踵而至的讨论与质疑声背后, 是规模数以百万计的高职高专生。

当前, 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高等教育体系。“为什么制造业还这么缺人才? 为什么我们的技术创新还是严重不足?” 这个问题深深困扰着李健。

经过查阅资料、走访调研, 李健认识到高端制造领域的一个现状, “大量产业的细节需要依赖劳动者的技艺完成。我国职业技术教育远远落后于产业发展, 这就需要从人才培养模式入手, 作出较大变革。”

如果把职业教育改革比喻成“万里长征”, 增设“副学士”最多只是迈出了第一步。

关于后续工作, 李健还有着系统思考, “要为学校和学生设立相应的标准。只有办得好的学校才能够授予学位, 也只有学习学得好的学生才能够获得学位。”一直在教学岗位的李健相信: 这样的激励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学校办好教育, 也能鼓励学生努力学习。

从事教育, 算是李健对父业的一种继承。李健父亲曾在安江农校工作, 与我国著名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是同事。李健出生的1964年, 也是袁隆平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年份。种种巧合, 又成为李健踏足并深耕教育领域的必然选择。

育人者, 必先育己。李健是淡淡的, 即便说到激动处, 声调也不会过高, 语气也不会太激烈, 总比别的人冷静几分。

在平淡和冷静背后, 我能读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浓烈, 那里有对祖国的热爱, 和希冀祖国强大的热盼。

任时光荏苒, 有这浓烈, 仍是少年。

